

中国经济学博士论丛

制度变迁与工业结构演进

崔民选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变迁与工业结构演进/崔民选著. -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4

ISBN 7-5017-4666-4

I. 制… II. 崔… III. 工业经济-经济结构-经济史-中国 IV. F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0264 号

责任编辑: 刘一玲

封面设计: 侯 茗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艺辉胶印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7.25 印张 200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7-4666-4/F·3539

定价: 18.00 元

序

陈栋生

过去，对工业结构的研究多注重于从结果分析入手，而忽略了结构形成的原因，特别是对工业结构形成的制度因素，即生产关系方面的分析没有予以重视。人们在分析影响工业结构变化的因素时，常常忽视了制度因素对工业结构即对资源配置效果的关键性作用。事实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我国特有体制转轨时期，工业结构形成较多地依赖于制度因素制约。基于此，《制度变迁与工业结构演进》一书的作者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从经济转型时期制约工业结构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制度变量入手，对我国的工业结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作者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作为制度意义上的结构问题。认为经济结构不仅是一种经济组织状态间的基本比例关系，而且是经济组织中的一种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的动态均衡与制约体系，它既涵盖着生产供给与消费水平的一般结构，又包含着这些结构的组织程序与决策因素即制度安排的制约。由于本文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考察工业结构演进问题，并指出工业结构演进是其微组织活动变化及其动态作用的结果，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以往人们仅从要素禀赋、技术、偏好静态配置资源的角度分析工业结构的局限性。全书把握住工业结构变化的两个基本视角，紧紧围绕着作为准则载体的体制与所有权现实表现的公有产权问题来研究我国工业结构的演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工业

结构问题更能抓住我国体制变化对结构形成过程的深刻影响。这与以往的分析有很大的区别。

其次，作者从不同的视角即从中国制度安排及其行为的结构绩效变化的总量方面；从我国资金配置主体由国家向企业转变的现实过程中考察了资金配置效率逐步递增与工业结构的关联效应上；从要素配置的计划绩效与市场绩效的比较中；从我国中西部市场化的不同水平的衡量上；从微观主体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效率分析中；从我国工业结构变化与国际水平的对比中，各个角度，环环紧扣，其主线始终把制度作为影响我国工业结构变化的一个内生的变量。这既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又使其分析建立在全面、可靠的现实逻辑基础之上。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极强的逻辑性是这篇论著的又一特色。

最后，作者由以上的讨论中自然而然得出，一国工业化水平是由其经济制度给定的准则与所有权的结构水平所决定的。因此，中国对市场制度的选择与对所有权的改造是调整工业结构最好的途径与必然结论。因为工业结构的配置只有依赖市场机制与微观主体的有效运行才可能获得最优。

总之，全书的分析立足于时段性与区域性两个视角的把握，焦点是围绕制度变迁与工业结构演进的动态过程及其效果比较分析而逐次展开的。这篇著作是一篇逻辑严密、理论性强、现实感浓、角度极新、独具特色的值得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参考、借鉴的优秀论著。

1999年3月18日于北京皂君庙

内 容 提 要

在以往的经济学文献中，对工业结构的研究多注重于从结果分析入手，而忽略了结构形成的原因，特别是对工业结构形成的制度因素，即生产关系方面的分析没有予以重视。人们在分析影响工业结构变化的因素时，基本舍弃了制度因素对工业结构即对资源配置效果的关键性作用。事实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我国特有体制之下，工业结构形成较多地依赖于制度因素制约。鉴于此，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从经济转型时期制约工业结构的最主要因素——制度变量入手，来分析我国的工业结构问题。

首先，本书在导论中提出了作为制度意义上的结构问题。认为经济结构不仅是一种经济组织状态均衡与制约体系，它既含盖着生产供给与消费水平的一般结构，又包含着这些结构的组织程序与决策因素即制度安排的制约。基于此，本书提出了制度变量对工业结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观点。由于本书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考察工业结构演进问题，并指出工业结构演进是其微组织活动变化及其动态作用的结果，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以往人们从要素禀赋、技术、偏好静态配置资源的角度分析工业结构的局限性。接着导论中对全书作了一个轮廓性描述，并提出了分析工业结构变化的两个基本角度，即把工业结构放在不同的时序空间与区域空间点上进行动态比较。

导论中着重强调的是对制度内涵的界定。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我们认为：制度是一种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的准

则与所有权的集合。制度与制度安排有所区别：制度所强调的是行为准则，制度安排重视的是规则和所有权的具体化。正是从此出发全文贯穿着作为准则载体的体制与所有权现实表现的公有产权问题成为影响工业结构变化的内生变量与制约因素。

第二章：从制度的两重含义出发，对中国制度安排及其行为的结构绩效分时段时行总体考察。(1) 分析了我国计划制度下的政府宏观意图对工业结构的影响；分析了市场化过程中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双轨运行对我国工业结构产生的效应；并对市场体制确立中的工业结构态势提出了认识。(2) 认为国有经济布局问题与公有制限定下的传统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无法使资源达到有效利用，也不可能使资源配置到收益率较高的行业中去。因此对制约工业结构的市场主体企业组织问题的分析成为本章不可缺少的内容。

第三、四、五、六、七章为全书的核心内容。这些章节从不同的角度即较中观与微观的角度对制度及其组织效率与工业结构演进的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第三章：在中国传统体制下，资源的配置实际上是对资金的分配，短缺经济的直接反映便是资金短缺。国家用计划的、行政的手段分配资金（以收入融资为基本表现形式的），即国家从微观主体手中获得更多资金剩余，来推动经济增长与结构转换；在转型体制下，国家由于与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特殊的关系，国家无法摆脱融资主体的角色，更无法摆脱债务人的角色，因此，工业结构变化直接体现的是债务水平及受债务约束的产业发展能力的局限制。当融资主体由国家转为微观主体企业时，产业的配置更多地与企业的行为有关。随着市场制度的建立，市场配置资金机制、功能开始健全。这时，企业的行为既受约束，也受激励。因而，企业从其生存、发展的角度考虑，这就产生了对工业结构调整的积极效应。

第四章：分两个层面分析：一是首先对我国要素（即资本与劳动）配置的行业结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二对不同阶段的要素增长率与效益进行了判断。结论表明：随市场化水平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在明显提高。具体表现在市场制度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使工业结构型出现高度化取向的态势。

第五章：分析了市场主体企业规模间的构型。即对我国大中小企业规模结构进行了考察，并对企业规模效益进行了评价与分析。认为与市场制度下形成的企业规模有严格的区别：中国大中型企业基本是计划制度决定下的产物。因此，过去由国家卖断、买断的大中型企业并不能有效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在向市场化转轨过程中，由国家意志配置的大中小型企业结构逐步在改变，市场化因素制约的规模结构水平在加强。对此，评价我国企业规模效益应有所区别。本章分析表明：经济效益与制度，特别是与所有权结构有相当的关联，产出主体的效益实现才是工业结构有效调整的前提。

第六章：从地区角度分析工业结构变化与结构效益，这不仅有利于了解我国东中西部工业发展状况及其水平，了解各地区经济水平与市场化状况，而且可以针对现实状况提出我国工业结构调整的对策。

第七章：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工业结构配置必将成为世界产业配置分工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工业结构形成也必然受世界市场变化的影响，工业结构与国际竞争密切关联。分析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及其结构水平；分析外资对我国工业结构配置的作用；将我国产业结构与国外产业结构进行比较，这不仅可以看出我国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而且将能适时定势、补短补缺促进我国工业结构水平提高，从而增强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这便是本章的内涵。

最后一章既是对全书思想的一个注解，又是对工业结构调整思路、对策的总结。一国工业化水平是由其经济制度给定的准则与所有权的结构水平所决定的。因此，中国对市场制度的选择与对所有权的改造是调整工业结构最好的途径与必然结论。因为工业结构的配置只有依赖微观主体的有效运行才可能获得最优。

总之，全书的分析立足于时段性与区域性两个视角的把握，焦点是围绕制度变迁与工业结构演进的动态过程及其效果比较分析而逐次展开的。

目 录

1 导论: 制度引入, 工业结构研究的新角度	(1)
1.1 制度意义上的结构问题	(2)
1.2 分析的基本思路与框架	(5)
1.3 研究范畴的两个视角	(8)
1.4 制度内涵的再界定: 准则与所有权	(18)
2 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的工业结构考察	(29)
2.1 体制与结构	(29)
2.1.1 计划体制决定下的工业结构问题	(29)
2.1.2 市场体制建立过程中的工业结构态势	(35)
2.2 所有权意义上的工业结构分析	(49)
2.2.1 我国国有经济布局	(49)
2.2.2 国有企业产权与效率	(56)
3 结构成长: I 融资制度	(65)
3.1 国家直接投融资分析	(65)
3.1.1 收入融资及其分配	(66)
3.1.2 债务融资及其效应分析	(72)
3.2 企业直接投融资选择	(82)
3.2.1 企业融资的涵义及形式	(82)
3.2.2 企业融资的产业效应	(87)

4	结构成长：Ⅱ要素配置	(92)
4.1	工业要素配置及其实现	(92)
4.1.1	资本要素配置的行业结构	(94)
4.1.2	劳动要素配置的行业结构	(99)
4.2	工业要素增长率与配置效益	(103)
4.2.1	结构变动过程中的要素贡献	(103)
4.2.2	要素增长及其效益评价	(107)
5	结构水平：Ⅰ企业规模	(124)
5.1	我国企业规模结构分析	(124)
5.1.1	市场制度下的企业规模决定	(124)
5.1.2	我国企业规模结构分析	(127)
5.2	我国企业规模效益评价	(137)
5.2.1	工业企业规模效益比较	(138)
5.2.2	工业企业规模效益评价	(143)
6	结构水平：Ⅱ地区分析	(148)
6.1	地区间工业发展状况分析	(148)
6.1.1	东中西部工业增长分析	(149)
6.1.2	东中西部工业结构比较	(151)
6.2	地区间工业结构效益分析	(156)
6.2.1	东中西部企业结构效益评价	(156)
6.2.2	东中西部工业规模效益比较	(158)
7	结构水平：Ⅲ国际竞争	(163)
7.1	我国国际贸易增长	(163)

7.1.1 我国国际贸易增长情况	(164)
7.1.2 外商直接投资的布局变化	(176)
7.2 我国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	(186)
7.2.1 我国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	(186)
7.2.2 对外贸易结构的国际比较	(194)
8 基本结论：结构调整	(198)
8.1 制度变迁与资产重组	(198)
8.2 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	(203)
主要参考文献	(211)
后 记	(219)

1 导论：制度引入，工业结构研究的新角度

“八五”期末，“九五”之初，我国经济进入了以结构加快变动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加快结构调整，既是巩固近几年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成果的需要，也是促进产业和技术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再上新台阶的需要。目前，我国工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大致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1）是一般加工业生产能力和严重过剩；（2）是重复建设和区域生产结构趋同；（3）是存量结构调整障碍较大；（4）国有经济产业布局很不合理抑制了主导产业的发展；（5）市场主体企业组织结构与规模结构严重不经济。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改变所致，但是深层次的原因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离不开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多种因素的制约。在以往的经济学文献中，对工业结构的研究多注重于从结果关系分析入手，而忽略了结构形成的原因，特别是对工业结构形成的制度因素，即生产关系方面的分析没有予以重视。事实上，在我国特有经济体制之下，工业结构的形成较多地依赖于制度因素制约。鉴于此，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角度，从经济转型时期制约工业结构的最主要因素——制度变量入手，来分析我国的工业结构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发生的，作者希望以此为切入点，阐述一些带有制度色彩的结构特征，引出一些有益的探索。

1.1 制度意义上的结构问题

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如何利用有限资源并实现其价值的一门科学。萨缪尔森说：“任何社会，不论它是完全集体化的共产主义国家，南洋群岛的一个部落，资本主义的工业国家，道教群体，甚至是一群蜜蜂，都必然要遇到三个基本的和相互关联的经济问题。”^① 这就是：生产什么产品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产品和为谁生产产品。萨缪尔森抓住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基本范畴，强调了经济组织的基本问题：即生产结构、技术结构、消费结构，但他却忽略了一个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愈来愈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即由谁作出生产决策，用什么程序作出决策。当然在萨氏的经济学中常常渗透着相关的内容，但他却未对此作出画龙点睛的注解。而斯蒂格利茨却在他的《经济学》中强调了这一点。这在新的意义上完善了经济学的内涵，也就是说经济制度及其决策程序是影响生产结构、技术结构、消费结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常常对经济组织的形成、运行起关键性作用。

由此可见，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资源的组织和分配问题，这既包括组织与分配的条件、状态、效果等；又包括组织与分配的程序与制度机制问题，也就是由谁以什么方式组织的问题。经济学家的基本假定是：经济资源利用上的“帕累托最优”，认为内生效率极大化、而外生变量趋向于无穷正。事实上“帕累托最优”是不存在的，正像“完全竞争市场”并没有存在过一样，而垄断、半垄断与非经济因素操纵的市场却比比皆是。这就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组织选择过程及其决定的现实环境。

①：[美] 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第38页。

我们知道，在以往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制度因素常常是排除在外的，即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或给定的，把它看成是经济变量中的剩余。其实，这种经济增长理论在仅仅把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当做基本变量时，却忽视了当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是既定的时，生产率却在发生着变化，经济增长亦出现了新的拐点的事实。

那么是什么使生产率发生着变化，是什么使经济增长出现新的拐点呢？看来只有从制度这一特殊要素入手研究经济现象及其本质才是问题的关键。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曾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① 其实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成与发展正是一种制度交易规则的实现，或反映。

据上推论，我们可以分析经济结构的内涵，经济结构不仅是一种经济组织状态，而且是经济组织的一种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的制约体系。它既含盖了生产供给结构、技术组合结构、消费水平结构，又包括了这些结构的组织程序与决策因素，即制度安排制约。从更细的层面看：企业组织结构、企业间规模结构形成、产业的区域结构差异，无不渗透着上述因素的制约。

以往人们对经济结构概念的定义并不少。佩卢认为“表示在时间和空间里有确定位置的一个经济整体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关系”，^② 他的这种认识仅把经济结构当成是一种视觉关系，且是数量上的表现。而丁伯根阐释的经济结构是“对有关经济的某些

① 道格拉斯·诺斯：《西方世界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1页。

② 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2页。

变化作出反应的方式的不可直接观察到的特征所作的考虑”。^①这一定义恰与佩卢的相异。佩卢着眼点是经济结构可观察的一面；丁伯根则强调经济结构不可观察到的特性。佩卢认为可以用数量关系直接表现经济结构关系，丁伯根相信用经济功能形式化的系数体系间接表现经济结构关系，当然，他们两人都认为用数理公式可以表示经济结构关系。其共同点反映了数量学派对经济结构的观念。另有一些人把经济结构定义为各种经济关系的结合形式，其各部分间的相互依存是以其对整体关联为表现的。这种解释虽然涵盖了经济结构中的质量关系，但都很笼统。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结构的理解部分地淡化了社会文化因素与经济关系。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却在生产关系上大作文章。譬如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中，经济结构的含义分为两层：一是主指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表现的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一是指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再生产各个方面的组成和构造。这种分析体现了经济结构的系统性与整体性，也表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经济结构的部分内涵。

从实证意义上看，经济结构本身一直在演化着，并且变得愈来愈复杂。因此，经济结构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在时序与空间上的生成体。它具有皮亚杰结构主义意义上的某些属性即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②同时，它又具有现实发展中的非协调性、矛盾性、耗散性。这些特性决定了结构作为一种动态生成体的复杂性。为了研究需要，本文所拟的经济结构是产业发展中的结构即产业内部结构的生成、关联、约束与效果，亦即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的工业结构的现实构型与发展趋势，特别强调的是要把

① 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72 页。

② 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72 页。

影响结构形成、变化、发展的制度因素作为分析的主线放在本文中。因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组织和行为规则约束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结构和组织安排，对于人们的行为影响是不同的。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条件下，有的制度结构就比较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而另一些制度结构就可能不利于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长”，^①“因为效率的真正含义来自于制度，制度界定了有益可图的交换范围”。^②对于经济结构制度而言，特别是经济制度既是一种内生变量，也是一种外生变量，也就是说制度对于经济结构的影响是通过机制效率与外部性作用表现的，而机制效率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却是最为基本的。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从一个新视角提出：制度变量对经济结构成长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的观点，并从中国制度变迁对工业结构变化效应的实证分析中进行系统的论证。

1.2 分析的基本思路与框架

由于本文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变量来考察结构问题，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以往人们仅从要素禀赋、技术、偏好静态配置资源的角度分析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的局限性。认为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是其微组织活动变化及其动态作用的结果。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在短缺经济条件的制约下，经济发展的最初选择必然是非均衡的宏观配置，资源配置效率决定于国家

① 费方域：《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出版社，第289页。

② [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著：《经济利益和经济制度》，上海三联出版社，第14页。

宏观经济运行效率。因此，80年代以前，国家公有制主体代理人对资源配置的结果表明了其宏观意图与战略目标选择的刚性。经济结构构型的宏观性既决定于经济条件，又决定于计划制度的安排。由于计划制度的安排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中具有了公有制的内涵，所以“当稀缺资源的所有制是共有的时，排它性与可让渡性都是不存在的。没有人会节约地使用一种共有资源，也没有人有权将资源的所有制安排给其他人。严格地讲，作为一种实际情形，如果一种资源是真正稀缺的，其属性就不可能完全不存在，当资源是完全共有的时候，排他性可以通过资源的实际使用而获得”。^① 因此：“既然所有制常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存在，对所有制的发展与它的内容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要检验那些用来确定所有制的权利束发生变化的原因。从这一点上看，所有制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对相应的成本与收益的回应。一个关于所有制的实证理论需要对决定所有权结构的因素有一个系统的论述。”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看，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形式；同理，不同的资源配置形式也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及其效果也就是制度作为一种准则与所有权的结合对经济结构的贡献率。所以我认为经济结构是一种组织体系及其变量的演绎过程状态，而制度是其中最基本的一个内生变量。

所以研究我国工业结构的变动必须考察制度变量及其作用。本文的结构设计便是基于上述思想意图而确定的。

首先，从制度意义上结构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提出了本文研究范畴的两个角度，接着对制度含义及其功能等进行定义，为后面的分析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①（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和经济制度》，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